

辛亥革命在直隶

一、辛亥革命前后直隶各革命团体的继起及其活动

直隶（今河北省）处于清廷周围，“天子”脚下，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中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封建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，把中国人民推进了灾难沉重的深渊。地处京畿的直隶人民，身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蹂躏和压榨尤为惨重。但是，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直隶人民，在义和团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，曾大显身手。随着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壮大，直隶的一些革命志士也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。辛亥革命以前，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并且组织了一些革命团体。武昌起义爆发后，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，直隶革命党和革命团体就更加活跃起来。

铁血会就是当时北方有名的革命团体之一。1894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。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，倡导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。当时，直隶丰

润人丁开嶂于日俄酣战之际，在北方建立了抗俄铁血会，并且发表檄文，要“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，树我完全独立之旗”^①。1907年丁开嶂在丰润青坨庄成立振武社，作为铁血会本部。丁开嶂任总理，丁东第协助。并建立了京东、京北、边外、关东铁血会四个支部。武昌首义后，丁开嶂将其铁血会成员分为京东、京北、边外、关东四部军。铁血会会员“东走关内外，西游京、津、通、张，促其各部军”^②准备起义，促进共和，推翻清王朝的统治。

1906年，蠡县陈幼云（兆雯）先生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，在保定建立了同盟会河北支部。次年冬，他联合十几位同志在保定西关创办育德中学，并任该校校长，培养革命青年，把该校作为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。在他的教育和直接指导下，很多青年后来奔赴九江、太原、昆明、北京等地参加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、倒袁和倒曹之役。武昌起义胜利后，保定“各校停课，育德中学就变成保定一带革命的总机关”。^③有不少人在这里学习装配炸弹技术，准备起义。“当时大家都极为兴奋，认为数日之内国事当大有变化”^④。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之后，保定同盟会会员进行阻碍官军南下的工作，一些革命党人深入到任丘、完县、雄县、蠡县等地，宣传革命思想，组织起义。

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京、津之后，居留在这里的革命党人乘机活动起来。以李石曾为首的北京革命党

人利用半公开的组织“义兴局”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。在天津，不少学校和附近州县也涌现了革命团体七八个之多。辛亥 9 月间，天津女师和政法学堂的地理教员白雅雨（名毓昆，南通人）和学生胡宪（字伯寅，河南人）等人组织的共和会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参加的约有 20 来人，公推白雅雨为会长，胡宪为副会长，机关设在老西开天主教堂前面广场东边的小平房内。共和会曾多次研究策动滦州新军举义的问题，并派会员凌钺、张良昆、王葆真等人赴滦州鼓动革命。后来滦州起义爆发，不少会员参加了战斗，失败后惨遭杀害。

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，当时在北洋新军中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团体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。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管带冯玉祥、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，为了传播革命思想，联络革命同志，就和郑金声、王石清、岳瑞州等人发起组织了武学研究会，公推冯玉祥为会长。武学研究会采用读书的形式，密图举事。后来参加的官兵竟达 1500 余人。由于加入的官兵越来越多，风声过大，不易保密，冯玉祥等人又另设山东同乡会。武学研究会转入隐蔽活动。同乡会有计划地推举反动军官潘矩楹为会长，利用他作招牌，遮人耳目，掩护武学研究会的革命活动。后来，冯玉祥、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都成了滦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。

活动在直隶的各革命团体和大批革命党人，在辛亥革命前，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传播革命思想，读一些进步书刊，提高民族革命的思想意识，做好起义的思想准备

和组织准备工作。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党人的活动，由宣传鼓动转到了直接发动和组织起义。当时京、津、滦、保、通、张家口等地的革命党人多次秘密集会，有的深入下去直接发动起义，有的打入新军内部策动起义。

直隶各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。南方的革命党人在取得武昌起义胜利之后，就非常注意组织和发动北方革命的问题。1911年11月12日，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武昌宴请京、津、保各革命团体代表，研究南方革命党人北上问题。当晚，人们感到，“为革命安全计，惟有北上，动员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军民响应革命，推翻清室，动摇袁氏根本，实为目前迫切要图”^⑤。席间，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。11月14日，胡鄂公渡江至汉口，乘怡和公司轮船东下，11月24日到达天津，住在紫竹林长发栈。当晚，与在津革命党人孙谏声、华朗轩、陈之骥、胡伯寅、李孝通、白雅雨、凌钺等人聚会，讨论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等地如何组织和发动起义的问题。

胡鄂公自1911年11月24日到津，至次年2月下旬离去。在三个多月的期间内，为了推动北方革命的发展，他在天津搞了一些宣传、组织、筹饷等工作。1911年12月14日，由胡主持在天津小白楼成立“北方革命协会”，到会的有同盟会、铁血会、振武社、急进会、克复堂、北方革命总团、共和革命党、北方共和团、女子北伐队、女子革命同盟等组织的代表18人，以“协助革命军北伐，崇奉孙先生三民主义”为宗旨，并订协

会简章九条，作为各团体联合的基础^⑥。1912年元旦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。1月27日，胡鄂公组织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津军都督府，并制定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大纲，对总司令部的职权范围、任务做了具体规定。由于时间较短，各地党人多是分散活动，这个组织没起什么作用。2月12日清廷退位，孙中山先生向参议院辞职，17日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。于是北方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吉祥里14号开会，议决“所有各团体革命活动，自本日起，一律停止或解散”。^⑦自此，北方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宣告终结。

二、“士官三杰”密谋联合和滦州“兵谏”

辛亥年间，全国革命风暴接踵而起。清廷为向革命示威，挽救垂死的命运，决定这一年在永平（今河北卢龙）举行秋操。这次秋操分东西两军对进演习。东军由秦皇岛沿海一带登岸西进；西军由通州方面东进。战时东军先胜，最后胜利归于西军，并进行总阅兵式。西军将士多是满人，东军将士多系汉人，预计这么一种结局，目的是在夸耀满洲人最终是不可战胜的，借以稳住大清朝“万世一系”的江山。这次秋操以载涛为大元帅，派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，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、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辅；西军以舒清阿为总统官，禁卫军军谘官田献章、哈汉章辅助。参加秋操的队伍，禁卫军为第一、二、三混成协；新军为第一、四、六、二十

镇及第二混成协（协统为蓝天蔚）。限定 10 月上旬禁卫军集中开平待命，新军集中滦州待命。

吴禄贞、张绍曾、蓝天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，三人倾向革命，志趣相投，过从甚密，曾有“士官三杰”之称。“三杰”认为，永平秋操是可以利用的好机会，于是和“诸革命同志秘密议决，乘此秋操，新军实弹射击，先将禁卫军扫清，再整军人京，密约武汉同时举兵，使清廷首尾难顾，一举灭之”。^⑧10 月 10 日，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本镇各军官佐，行抵昌黎县崔庄，冯国璋驻兵团山。当天晚上武昌起义爆发，清政府见势不妙，即急电停止演习，并召冯国璋先返北京，统筹编制之策。11 日清廷令二十镇混成一协暂住滦州听候调用。内定第二、四两镇和第六镇一协编为第一军，由陆军大臣荫昌统领。第二十镇和第三、五两镇各一协与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，由冯国璋统领。第一镇及禁卫军为第三军，由载涛统领。第一、二两军赴前敌作战，第三军留守京城，以备后援。因此，令集中滦州待命的新军各返原防，听候调编调用。从各地来到滦州的新军相继离去。只有张绍曾部拒绝受命，按兵不动。

10 月 13 日，张绍曾在京探得调编的消息后由京返回奉天，立即约集第三镇统领卢永祥、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、本镇统领伍祥贞、潘矩楹谋划。张绍曾当时宣言：“湖北兵变，为除专制，主共和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，凡属同胞，谅皆赞助。今吾辈所统各部队，半属北人，虽未预约同谋，应皆晓以斯义，倘冒然而往，胜则

自残同类，负亦死无指名。’^⑨因而打算用兵力要求清廷立宪。

当时，清政府为应付武昌起义，已经十分吃力。荫昌率领的第一军战事不利，张绍曾又按兵不动。这使清廷更加惶惶不安。“此数日中，清廷无日不檄电飞驰，促其拔队前进”^⑩，张绍曾将奉天所有步、马、炮各部队以及装械子弹组织完备之后，于10月20日带往滦州。当时陆军部已派人由京带车辆来滦，敦促张绍曾迅速赴鄂救援，张绍曾当着众人说：“湖北革命，名正而言顺，专尚征讨，不合人情，况以同种相残，世界无此蛮行，所有军队，均不前进。”^⑪28日，张绍曾便领衔通电，提出十二条政纲。这十二条政纲是：

（一）大清皇帝万世一系。

（二）速开国会，本年内召集议员。

（三）改定宪法，经国会议决，以君主之名义宣布之。

（四）宪法改定提案之权，属诸国会。

（五）全国海陆军归皇帝统帅，但对内使用，须遵守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。

（六）格杀勿论、斩舍御免、就地正法、死刑等律，不得以命令行使之。又对于一般人民之违法监督，不得随意逮捕。

（七）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，并擢用之。

（八）组织责任内阁，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之，以皇帝敕任之。又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之。但

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。

(九) 人民负担之增加及关于媾和等国际条约，经国会议决以君主之名义宣布之。

(十) 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之前，不得照前年度预算支出。

(十一) 上议院议员以法定之特别资格，由国民公选之。

(十二) 现时规定之宪法、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，当解决之际，军人有参与之权。^⑫

张绍曾的态度非常强硬，“随遣使责立宪条件于清廷，迫其停战，令速行宪政”^⑬。

张绍曾在电迫清廷要其接受立宪条件之后，又扣留了清政府从东北运往湖北前线的大批军火。这批军火启动之前，押运军火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就密电张绍曾，“珍等恭逢运输之役，苦无挽救之方，军火到滦，望公等妥为保护”^⑭。绍曾得电，即将军火扣留。他一面电告清军咨府，军火“暂留滦州，借示革命可以调停之证”；一面电告武汉革命军黎元洪、黄兴、宋教仁、汤化龙、孙武等人，“使知后顾之忧，尽力支持，以期达到革命之目的”^⑮。军械留滦，清廷非常着急，于是让冯国璋、段琪瑞等电达张绍曾，进行恭维、恫吓，诱其放运军火。清廷又恐冯、段等人的电报不能立即发生效力，而后又让章远采等致电张绍曾“请速令前日扣留之军火，即日放运为盼”^⑯。尽管清廷进行软硬兼施，但都遭到张绍曾的拒绝，局势立趋紧张。

清廷见电报不能发生效力，就派张绍曾在贵胄学堂的学生载洵到滦州疏解，张绍曾根本不听，严词拒绝。于是清廷便使出了一箭双雕之计，特派吴禄贞于 11 月 2 日前去滦州抚慰，进行劝导。吴禄贞去滦州，并不是出于清廷对他的信任，而是想借此拴住吴禄贞的手脚。吴禄贞抵滦后，并未照办，反和张绍曾等人密议说，“南方已乱，北京空虚，设提一旅之师，大功垂手可得。今滦州军队，已近万人，悉皆精锐，直抵丰台，以逼于北；禄贞由保定调部下所余一协直抵长辛店，以逼于南；三镇二协，再为后援，何求不获，何事不成”^{①7}。这就把“兵谏”发展为“兵逼”清廷就范。参加吴、张密谈的大都是他们的亲信和革命派。其中，随吴来滦州的陈其采是他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又是革命派陈其美的胞兄。不料这位以军咨府厅长身分随吴来滦的陈其采，原来是监视吴禄贞的特务。会后用饭时，吴禄贞等人才发现“陈其采溜了，停在滦州车站上的所有车皮全都开跑了”^{①8}。张绍曾、吴禄贞原来“拟由汽车（指蒸汽机车）南北运驶”军队，夹逼北京的计划，因此全部落空。

清廷得到陈其采的密告，决定对张、吴等人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镇压。首先把矛头指向张绍曾，以平息“滦州兵谏”。10 月 30 日，清廷下诏罪己，明令取消党禁，释放革命党人。并命咨政院立即草拟宪法十九条，同时传令嘉奖张绍曾，授予侍郎衔。清廷做这种让步，并不是虚心纳谏，主要是因为武昌起义闹得不可开交，

防止并和缓张绍曾的进一步行动。清廷经过和袁世凯的讨价还价，并于 11 月 1 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后，5 日，就削去张绍曾的兵权，免去他第二十镇统制官职务，“授为宣抚大臣，驰赴长江一带”^①。以其部下统领潘矩楹充任第二十镇统制。

张绍曾被解除统制以后，第二十镇留在滦州的官兵非常愤怒，群起挽留。王金铭、施从云召集张之江、石敬亭等 70 余人举行会议，认为张绍曾的去留，关系着北方革命的成败，一致要求张绍曾切勿受命离去，并电请清廷收回成命。王金铭、施从云率所部谒见张绍曾，劝他“不如整我旗鼓，直指燕京，脱离二百余年满清之专制，恢复我四万万汉族之主权”^②。当时，革命党人陈之骥等人也到滦州“游说张乘机发动，张初亦慷慨激昂，跃跃欲试，兵士均集车上，燃火待发。张到站，临上车时，手握车杆，一脚踏车不登，一脚踞平地，徘徊多时，仍自转身跑回司令部”^③。11 月 9 日，张绍曾回奏清廷“因病恳恩开去差缺，回津就医”^④。拒绝南下长江一带“宣抚”。不久，就到天津去了。由于张绍曾的消极动摇，“三杰”会师直捣京城计划，乃成泡影。

三、燕晋联军和吴禄贞被戕

1911 年 11 月 30 日，山西宣布独立。清政府命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所部到石家庄防堵。当时第六镇的十一协已改为混成协编入第一军，由荫昌带到湖北作战。吴禄贞命吴鸿昌统领的第十二协到石家庄堵截

山西革命军。

这时，吴禄贞还未出京，清政府内的反袁派载涛、良弼等人一向和吴联系紧密，打算利用这个机会，铲除袁世凯的势力，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并对荫昌前线作战接连失利表示不满。吴禄贞对此“漫应之”，而心里想的却与他们“根本不同”^②。一天，吴禄贞的副官王孝缜找到在京的革命党人何遂说，“绶卿（吴禄贞的字）要见你，请你去一趟”。何遂见到了吴禄贞，吴说，“武昌战事荫昌打得很不好，他大概吃不消了。载涛把我找去告诉我山西已经宣布独立，派我一协人到山西去镇压，你跟队伍去，担任十二协的参谋，马上动身到保定去报到”^③。吴禄贞还告诉何遂，十二协统领是吴鸿昌，何遂觉得和吴鸿昌都是保定陆大的同学，是老相识，便高兴地去了。

11月2日，吴禄贞在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夹攻北京的计划被陈其采盗走之后，感到十分紧张，没有在滦州住下，立即折回了北京。次日，吴禄贞与载涛深谈数小时之久，取得了倒袁的相同意见，3日夜经保定返回石家庄。这一天何遂和吴鸿昌率领十二协的三营人到井陘察看了一趟。按照何遂的建议，在头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留下了三个营的一些士兵后，当天返回了石家庄。不多时，吴禄贞来了，住在站长办公室。何遂见他 and 吴鸿昌、旗兵统带等正谈话，就找到了吴的副官周维桢，把山西兵力空虚，自己有意把队伍分散驻扎的情况向周述说了一遍。周维桢很高兴，也同时把吴、张密谋夹攻

北京的计划被人盗走的情况告诉了何遂，并说，吴禄贞“现在危险得很”^⑤。周维桢将何遂活动的情况向吴作了汇报。当晚，吴禄贞向清政府内阁致电，编造假情况说，“11日（即阳历11月1日）禄贞亲赴井陘督师进剿，12日与革命党接战，相持一日夜之久，革命军不支，退守娘子关。连日获虏革命军官兵数十人，卸其军械，开诚劝导，即行释放”等等^⑥。4日晨，何遂向吴禄贞要求到山西去一趟，吴即答应，让他次日去。这时，守卫车站的士兵来报告，有一列火车进站，是运军饷、辎重到汉口前线去的。吴禄贞派人扣留了由北京运往湖北的军械，并电奏清廷“愿以只身赴鄂，晓以大义，命其投诚，以挽危局，倘彼不从，当率部二万人以兵戎相见，朝廷若不速定政见，深恐将士激忿，阻绝南北交通，而防碍第一军之后路，则非禄贞所能强制也”^⑦。态度十分强硬。

石家庄是京汉、正太铁路交叉处，扼住清军南下的咽喉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在清政府内部袁世凯对吴禄贞非常仇视，而载涛、良弼一派是想利用吴禄贞打击袁派，并不是真心合作。吴禄贞假报督师进剿，托词南下宣抚，已使清“中央惶恐”，当然不会允许吴禄贞在石家庄久留下去的。10月29日，山西巡抚陆钟琦被山西革命党组织的敢死队杀死，此后，山西巡抚出缺。11月4日，清政府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，“并令其迅速接任”，“以解除京汉中段威胁”^⑧。吴禄贞知道这是“调虎离山”，拒绝赴任。5日，他仍派何遂乘车到井陘与

山西革命军联络，约定于次日下午由吴禄贞和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娘子关面谈。当天晚上，何遂返回石家庄向吴禄贞做了报告，吴激动地说，“很好，我们明天就去”。

11月6日午后1点，吴禄贞率同张世膺、何遂、孔庚等人乘车抵达娘子关，阎锡山率温寿泉、赵戴文亲自来迎。会议都出席了，据何遂日记载：“吴禄贞在会上首先说，决不就任山西巡抚，愿意同站革命立场，与山西携手。我们眼前事，山西很要紧，可能山西光复，中国就光复。重要的在于起义适时，能使清廷震动。我们第六镇，加上张、蓝军与山西军，会师北京，就易如反掌。袁世凯是中国最毒的一个东西，他现在汉口，正在两边摇摆，若是投机，将来危险极了。我们现在早到北京，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，山西之重要可以想见。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堡垒，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，海疆是不可靠的，将来山西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所以山西的后面，也要好好布置。”吴又说：“我算什么巡抚，阎都督你是山西的主人，我替你带兵。”这时，下面队伍大呼“我们拥护吴统制为燕晋联军大都督”。阎锡山等人也认可，遂商定名为“燕晋联军”。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，阎为燕晋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，温寿泉任联军参谋长，山西开出两营，归吴指挥。“欢谈至晚，各返原地”^②。

6日晚，吴禄贞和张世膺、何遂、孔庚等人回到石家庄时，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由于吴禄贞截军械、建联军、扼住京汉铁路中段，使得袁世凯在汉口前线不

敢进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。于是，袁世凯便对吴禄贞用暗杀手段。他先用重金收买了原被吴禄贞撤职的部下周符麟。6日，周从彰德来到石家庄，暗地里召集一些军官开会。稍晚，“担任清廷交通职务的陈其采受良弼的使命从北京来^③，也参加了周符麟等人的会议，决定以重金收买吴禄贞的骑兵营长兼卫队长马蕙田等人，准备对吴下毒手。当时，何遂、孔庚等人曾几次报告吴禄贞：“危险，要警惕！”但吴却满不在乎，认为马蕙田是他的心腹，靠得住，并态度安详地说“我有何惧”。何遂提出，“山西队伍就快到了，是否派一营人来做你的卫队”。吴拒绝说：“不用了”。7日凌晨1点，吴禄贞正和参谋张世膺、副官周维桢，在车站办公室批阅机密文件。马蕙田带着参谋夏文荣、副官吴云章、排长苗得林进来见吴。客厅外是一个小院，马说，“来向大帅贺喜”，打千下去，趁机从衣服下抽出枪来对吴就是一枪。吴一看来头不对，随手掏出枪，从窗口冲到小院里，跳上墙还击，马蕙田等人连击，吴禄贞腿部中弹，从墙上跌下来继续回击，马等向外跑去，吴尾追到墙外，伏兵起，吴头部中弹身亡。马蕙田随即割去吴禄贞的头颅，张世膺、周维桢同时殉难。至此，在直隶震撼一时的“滦州兵谏”和“燕晋联军”进逼清廷的活动，由于吴禄贞的被杀而结束了。

四、滦州起义

(一)

潘矩楹继任第二十镇统制之后，从其反动的立场出发，想从根本上扑灭第二十镇的革命火焰。一方面，他加强戒备，制造恐怖，规定“军中不得集会，不得自由出入”^③；另一方面，暗中布满奸细，侦察官兵的动静。但是，潘矩楹的这些无耻伎俩，并没有挡住革命的发展。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一面令武学研究会坚持秘密工作，暗中沟通革命官兵的联系，一面和先期来滦州的革命党人白雅雨、凌钺、孙谏声等通力合作。这时滦州知州朱佑保、警察所长张注东等也已转向革命，革命的阵势更加扩大，谋取起义的活动更加积极起来。

潘矩楹看到驻滦州的官兵没有停止活动，于是便采取分散力量的办法，将队伍分开驻防，不得相互接近。他先将第七十八标开赴关外，分散在锦州东八家、沟帮子和葫芦岛，骑兵、炮兵、工兵等营队则开至秦皇岛、海阳镇之间。只将七十九标岳兆麟所率领的一、二、三营留驻滦州。此外，又将留在新民府的队伍调开，七十七标移至锦州一带驻防，八十标开至临榆，分散在秦皇岛至海阳镇一带。他以为这样隔开，就不致再出意外。其实，这并不能阻止革命官兵的秘密活动。当时，马队队官张之江、张树声、张振扬皆率部驻海阳镇。步兵第八十标二、三营管带郑金声、冯玉祥亦分驻此地。经常

秘密开会，派人与驻滦州的七十九标一、二营管带王金铭、施从云等往返商榷，共图大举。后来，不意谋泄。潘矩楹将马队再行分驻，并派两队士兵加以监视。

王金铭、施从云见第二十镇队伍已被拆散，起义的布置不得不重做安排。于是王金铭在 12 月 31 日秘密去海阳和冯玉祥商量。冯玉祥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铺子里。夜里，金铭就住在冯玉祥那里“密谈竟夜”^②。当时商定，“一俟烟台民军在秦皇岛登陆，第七十九标即在滦州首先发难。第七十七标、第七十八标、第八十标及骑兵、炮兵、工兵等配属营队则分路西进，会师滦州后，攻取唐山，加入先期秘密组织的武装，然后继续西进，联合驻防天津和北京两地附近的新军，围攻天津、北京。同时并约辽阳庄河的商震、朱霁青、王德权、程起陆、李树森、连成基等，率民军前来支援”^③。

王金铭于次日晨由冯玉祥处返回滦州，约集鹿钟麟、周文海、石敬亭、韩复榘、李子峰和早从天津来的白雅雨、凌钺、孙谏声等，齐集北关师范营部报告联络海阳驻军及辽阳庄河等处民军的情况，议决即日宣布独立。为了避免起义遭到掣肘，由王金铭、施从云代表革命官兵谏清标统岳兆麟一致行动。“兆麟借兵力薄弱却之。”金铭、从云等激于义愤，“迫之曰：‘标统为吾标领袖，赞成义举与否，一言决之。’”^④并让他担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，将起义部署尽情告知。岳兆麟是个十足的奴才，胆小鬼，听后很害怕。“频频摇首说，‘胆大矣！胆大矣！吾不敢为也’”^⑤，终于拒绝。次日晨便

逃离滦州，到开平向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告发。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知道岳兆麟“不足与为”，又和三营管带张建功商量；建功察革命势盛，阳示赞同^③，于是金铭、从云决定起义。

(二)

滦州革命官兵的行动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破坏，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在得到滦州举义的全部部署之后，立即发电向袁世凯请示。袁世凯采纳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建议，“一面设法解释，一面暗为严防”^④，派王怀庆先到滦州“便宜行事”，并同时“调遣劲旅，赴滦防堵”^⑤。

1月1日，王怀庆即驰滦州，企图以威迫欺骗的手法，瓦解革命官兵的团结。他传三个营的管带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张建功，知州朱佑保，警察所长张注东，滦绅刘雨棠、吴树臣等询问，“官绅支吾，未肯实对”^⑥，他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：“今南北议和，尚未成立，革命成败，更不可知。我辈军人，应忠职守，犖鞞之下，军人独立，不仅违犯纪纲，区区兵力，岂足与战。审时度势，实非所宜。望诸君善自采择，毋贻后悔”^⑦，并劝大家静候临时国会决议，以实行君主立宪为宜。王金铭、施从云听后正颜厉色地说：“清廷误国殃民，罪已昭著，海内之士，同举义旗，凡有血气，皆当振臂兴起，光我民族。公总领师干，宜以民意为重，不可冒此不韪，致招自危，我辈宣言独立，词义正大，心之所至，万死不辞！”^⑧官兵齐声赞同，气势甚盛。王怀庆见